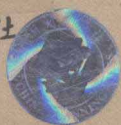


九十纪行

陈先 著



中国计划出版社



九十纪行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著 陈先



中国计划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九十纪行 / 陈先著.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80242-561-3

I. ①九… II. ①陈…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1520 号

九 十 纪 行

陈 先 著

☆

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 11 号国宏大厦 C 座 4 层)

(邮政编码:100038 电话:63906433 6390638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河富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1/16 16.75 印张 154 千字 8 页彩插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80242-561-3

定价:60.00 元

前 言

我的人生处于跨世纪的“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年代。我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培育下成长的。

今年是“五四”运动 90 周年。我是“五四”的同龄人。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变化，我的人生历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 30 年（1919 ~ 1949 年），我国长期处于硝烟密布的战争年代，经历了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旧中国的“三座大山”，结束了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正像毛主席所说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这个 30 年，正处于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从小深受“五四”运动的启蒙和历次革命运动的思想影响。1936 年发生“双十二”西安事变，当时我在宁波青年会夜校读书，开始参加宁波中国

共产党外围组织读书会推动的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3月我弃商从戎，经当时宁波中共地下党书记应起同志介绍，到皖南新四军教导队学习。1940年在皖东淮南抗日根据地经济委员会参加中国共产党。经过抗日战争的磨炼，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专门从事革命的风雨历程，从一个钱庄学徒开始成为一个抗日根据地从事经济工作的战士。

第二个30年（1949~1979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同时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前3年，经过1950~1952年的努力，加强财经统一，制止了通货膨胀，促进了经济发展，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当时中央财委拟订1950~1952年发展国民经济的奋斗目标，并对逐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些重大指标提出了控制数字，对指导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是一种指导性计划，是实行计划经济的探索阶段。1953~1957年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目标是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逐步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9%，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经济运行稳健有力，物价平稳，社会治安和风气良好，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

设积极性，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以后 22 年社会经济发展中，由于遇到 1958 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 1966 年下半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导致经济和社会的剧烈波动。三年“大跃进”，加上“人民公社化”，出现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并引来了此后五年的经济大调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造成社会混乱，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过全党、全国人民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抗争，才保持了后几年的经济艰难、缓慢、徘徊地增长。总之，1958~1976 年经济运行处在大风大浪中曲折前进的状态。1976 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的两年，百废待兴，经济的发展仍受到“文革”遗留问题的严重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的这 30 年，我主要从事综合计划工作。1952 年在福建省财委任副秘书长，主管计划工作。1953 年在上海任华东财委计划局副局长。1954 年调国家计委任综合局副局长。计划工作是一项崭新的工作。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都很重视，有很多指示，走的是一条艰辛、不平坦的路。30 年来，我共参与了 5 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除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得到顺利执行外，第二、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在制订和执行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左”倾错误的冲击和阻扰，难以顺利执

行。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通过的1958~1962年的“二五”计划建议，遭受1958年“大跃进”的冲击，被迫架空了。1966年原打算开始实行1966~1970年的“三五”计划，由于“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处于无政府状态，计划的执行受到严重干扰。1967年年度计划没有下达，1968年根本无法制订计划。侥幸的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三线建设的一些重点项目，如攀枝花钢铁厂、成昆铁路等，仍能排除干扰，继续施工，直至完成。1971~1975年的“四五”计划纲要，出台时就困难重重，原拟提交1970年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讨论，后因陈伯达反党事发，政治局会议没有正式讨论。1973年虽重新修订了“四五”计划纲要，也无法顺利下达和执行。1976~1980年的“五五”计划，由于粉碎了“四人帮”，人心大振，制订和执行都比较顺利。“五五”计划要求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1980年基本实现。

上述几个五年计划，尽管难以避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具体执行中要靠各个年度计划，根据实际情况修订落实。但五年计划决不能没有一定的约束性，把它束之高阁，随心所欲，放任自流，使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损失，这是值得我们铭记的历史教训。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革。当时运用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

于有效动员和集中国家有限的资源，迅速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保证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这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但由于经济管理权限过于高度集中在中央，经济管得过死，影响了地方、特别是企业以及其他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往往出现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现象，没有充分运用价值规律，忽视、甚至排斥市场的作用；过多采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忽视发挥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从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以适应现代化生产发展的需要，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第三个30年（1979~2010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30年，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经过6个五年计划、规划（“六五”~“十一五”）的建设，经济实力大大加强，国民生产总值持续增长，平均每年增长近10%。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固然，在前进过程中也带来了一些令人们关切的能源、环保和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付出了代价。现在又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和考验。总的来说，我国经济结构已经从传统的工业化逐步向现代化过渡；经济管理体制已经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

正在进一步完善和提高，这又是一个历史性的变革。

在这个期间，我主持过国家统计局工作；1981年重返国家计委参加“六五”、“七五”计划的编制工作；曾任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副组长；还担任过国务院物价小组组长，参与物价改革初期的研究工作。1988年被选任为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从事立法工作和参政议政。1990年开始从事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工作，分别担任中国信息协会和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的会长。

目 录

前言	1
一、情系故乡	1
二、走向社会	4
三、参加新四军	7
四、战斗在皖东淮南抗日根据地	10
五、北撤山东	18
六、参加上海接管工作	24
七、南下福建	29
八、调回上海	31
九、进入国家计委	33
十、经历三年“大跃进”	41
十一、参与五年大调整	45
十二、亲历十年动乱	48
十三、主持国家统计工作	56
十四、重返国家计委	74
十五、受任国务院物价小组	101

十六、当选七届人大常委和法律委员会委员	108
十七、从事中国信息协会工作	137
十八、参与促进宁波经济开发	162
十九、重温与思考	185
后记	194
附录	197

一、情系故乡

1919年12月22日（阴历十一月初一），我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新街的一个手工业家庭。

1925年进私塾（崇实学堂）接受启蒙教育，读了一年。

1926年至1932年，在连山会馆小学读四年初小，在星荫小学读二年高小后小学毕业。

我的祖籍在浙江省鄞县南乡姜山镇，靠近东海象山港和宁波的奉化江，是一个商业较发达的市镇。居民有一些是经商的，但多数以农业为主，也有一些渔民出海捕墨鱼、网海鲜。在祖籍，我家有二三间破旧的房子，旁边是一片开阔的农田，可以遥望矗立在平原中的一座葱绿的小山，这就是姜山。开春季节，景色宜人，小河流水，阡陌纵横，眼前是一片绿色的稻田和黄白色的油菜田，山坡上杜鹃花盛开，漫山遍野，交相辉映。小的时候，每年清明季节，一般都到故乡小住几天，拜望亲友。乡村的田园风光和清新的空气，宁静的环境，美丽

的景色，和谐的邻居，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清晰的记忆。



1986 年摄于故乡鄞县姜山。

姜山离宁波市区仅 15 公里。陈氏是一个大族，20 世纪 30 年代设有 8 所祠堂，分别叫作大本堂、雨钐堂、德馨堂、灵修堂、永恩堂、明德堂、龙凤堂、裕庆堂，并各有自己的辈行。

我们家的祠堂叫明德堂，原址在北村外，都叫裴家祠堂之北。我的父亲叫陈财照（学名文高），属文字辈，母亲孙氏，有三儿三女。我家的三兄弟均属章字辈，哥哥陈章德，弟弟陈章尧，我原名陈章华（乳名东海）。

父亲主持手工业务，哥哥做助手，姊妹们分别在袜

厂当童工，母亲勤俭持家，主持家务，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家庭。我的童年是在父母哺育下成长的。家庭给我的教育是要爱劳动，勤俭诚实，不要贪不义之财。

二、走向社会

1933年至1938年，我离开家庭，进入社会，开始过着半工半读、自食其力的生活，并走向革命。这是我人生经历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由于家庭贫穷，我无法去上中学，家里便将我送到宁波慎生钱庄当学徒。宁波人比较重视经商，到钱庄当学徒是学做生意的一个途径。我刚走向社会，对什么事都感到新奇，勤奋学习业务，很快就掌握了钱庄业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比如，我学会了打算盘，能辨别、鉴定银元和货币的真伪。那时候，我每天早上到客户的店铺去收现金、记账。同时根据客户的信誉，经老板允准组织放贷，通过优质服务，为钱庄挣利差。现金多了，还要到钱业会馆与其他钱庄做交易。这段时间，我学到了不少东西，会计的基础工作也比较扎实了。

在学习钱庄业务的同时，我也刻苦学习其他知识。利用晚上的时间，到附近的宁波基督教青年会夜校，先后学了三年英文，当时的教师有外籍牧师、归国学者和

上海来的大学教师。我还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了经济方面的有关书籍和簿记学等。钱庄里有上海《申报》、《新闻报》和宁波《时事新报》3份报刊，我每天都基本要通读一遍，扩大了知识面，从中了解了很多国内外的时事，并接触到了许多进步思想。我还阅读了反映红军生活的一些进步书刊。

1936年在夜校学习期间，我开始参加了中共宁波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读书会的活动，认识了同在夜校学习的浙东中学同学陈锦涛。他向我介绍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一些情况，并传播了许多重要的抗日救亡进步思想。读书会的活动，开始是单线联系，通过读书会形式个别活动，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活动形式开始从个别活动变为分别串联，组织了一些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陈锦涛初中毕业到义乌的邮政局工作，他将我介绍给谢寿达，并指定我以后与他保持单线联系。随着抗日救亡活动的深入发展，有一天，谢寿达告诉我，读书会要以鄞县政府宣传队为依托，把城内分设的读书会组织起来，进行公开活动，要我介绍一些进步的职业青年参加。抗战爆发后，以鄞县宣传队名义，在湖西宁波城防指挥部所在地公开组织会议，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宣传抗日救亡。这个时期，通过积极参加读书会的活动，扩大了知识面，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是我开始走向革命生涯

的重要时期。

这个阶段，为我以后从事经济工作打下了业务基础；为我弃商从军，投奔新四军正式参加革命队伍，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